

“岭南大学之父”钟荣光

民国年间，对著名大学校长的赞誉，有两个版本：一说是“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另一说是“北张（伯苓）南钟（荣光）”。无论哪个版本，钟荣光都并列其中，可见这位“岭南大学之父”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 | 邢 静

DOI:10.19417/j.cnki.tzgj.2020.03.012

“名下无虚士”

《论语》里说，三十而立。这用来形容钟荣光的人生大概再贴切不过了。在30岁之前与之后，可以说，他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1866年9月，钟荣光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小榄镇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当然，当时谁也不会注意到，两个月后，孙中山先生就诞生在相距不远的翠亨村。虽说鸦片战争后西风逐渐东来，但当时“学而优则仕”仍旧是社会上的主流思想。钟荣光4岁时随经商的父亲移居香港，在当地读私塾后回到省城广州就读于专门讲授八股文作法的“大馆”（专修文学的高级学舍）。他的师傅是当时岭南的名儒吴道镛（光绪六年进士）。名师果然教出高徒，十几岁的钟荣光已能熟练地写作八股文，在科举考场一展身手。24岁时，他就考中了“乡试副榜”。按说“乡试”考上的叫做“举人”，不过明清年间也有规定，于正式录取名额外，另取若干名为副榜。“乡试副榜”虽不能参加下一步考进士的“会试”，但可以直接参加下一轮的乡试，而不用同别的“秀才”一样，要经过全省“科考”筛选。清

初的名臣于成龙就是“乡试副榜”出身。光绪二十年（1894），钟荣光再接再厉，终于考中了甲午科广东第95名举人。

八股取士在当时已饱受诟病，但钟荣光的八股文做得的确相当好。在当时的广州文坛，他与刘学询、江孔殷、蔡金刚并称“四大金刚”，其所作八股制艺文章经常刊载在当时流行的《课艺日新》《文坛帜》等八股文范文汇编上供人学习。中举后，钟荣光索性自己在广州华宁里开办“大馆”，教授八股文章。他名声在外，自然“从学者众，收入自丰”。有钱之后，按照其老友胡继贤在《我记忆中的钟荣光先生》中的说法，钟荣光终日花天酒地，显得颇有几分玩世不恭的样子。

那边厢，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再败，使得日本在谈判桌上咄咄逼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京应试的粤省举子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十八省举子千余人“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轰动京师，波及全国。钟荣光的同乡孙中山组织的秘密革命团体“兴中会”也在这一年策划了广州武装起义。国难当头，人心思变。年轻的钟荣光受到时代风潮的强烈刺激，也开始了一生中最重大的转变。他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筹饷工作，并于1896年加入



钟荣光

了“兴中会”。

从此之后，30岁的钟荣光与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一刀两断。他断然剪辮易服，以示和清朝政府决裂。他认为救国宜首先开通民智，鼓吹爱国思想，于是投身新闻界，为《课艺日新报》《文坛报》等撰稿，其后又与人创办《博闻报》（不久改名《安雅报》）和《可报》，相继发表了不少抨击朝政、切中时弊的文章，因此而为清廷所不容。

1907年，钟荣光在天津考察北洋大学时，被清政府的密探以“革命党”“图谋不轨”罪名逮捕入狱。他自忖必死，曾作诗曰，“世间并无不死药，我生最爱自由花”，表明准备为国牺牲的决心。幸好粤籍官绅钟锡璜、江孔殷两位举人，还有同乡唐绍仪（时任天津海关道员）、陈昭常（时任锦山海关道员）等人纷纷出面营救；最终钟荣光才得以“查无实据”开释，历时35天而幸免于难。释放之日，恰好警局提调（职务）某某亦是科甲出身，听说钟荣光是“南中文豪”，提议两人各拈一题，分作八股文“开讲”一段。这名为纪念，其实就是想看看钟荣光的才华究竟如何。其题为《中庸》二句（“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钟先拈得下句，刚好切合自己此时此地的“铁窗风味”，文思泉涌，一挥而就，先行交卷。该提调随后完卷，捧读钟文，长揖致敬，称钟先生不愧是“名下无虚士”，即以大礼送至天津海关道，备受厚待而后南返。

辛亥革命不过一月，广东即告光复。钟荣光出任广东军政府教育司长，这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段从政经历。作为前清举人，钟荣光当然饱受儒家文化教育熏陶。但他在出任教育司长后，却果断改革旧学，提倡新学，废除清代关于学生“尊孔”“读经”的规定，下令拆毁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匾额旗杆和神像，还将清代的科举试场改为公共体育场。他根据当时广东文盲众多的实际情况，特别重视社会教育，设立图书馆、图书室，并派出巡回演讲队到各县市宣传新文化和科学常识，破除封建迷信。通过各种图片、幻灯、白话戏、通俗小报、新式通书等向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为了推行阳历，1913年钟荣光还曾下令各校在阳历新年放假两周，阴历新年严禁放假，学生一律上课，如学生请假过半，给校长记过的处分，若擅自放假，则扣发校长薪水半个月。到了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龙济光入据广东，大肆镇压革命党人。钟荣光也被搜捕，被迫出走香港转赴美国，从此脱离政界（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一度出任国民议会参议员）。在太平洋舟中，他感怀时局，痛惜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写成《广东人之广东》一书，列述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他任教育司长时期广东军政府革旧布新的各种措施，让海外华侨及时了解到了辛亥革命后广东的真实情况。

从“格致书院”到“岭南大学”

1888年，美国的哈巴·安德在广州的沙基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开办格致书院。所谓“格致”两字，在古籍中原指“格物致知”，清末以后，又逐渐成为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统称。在广州的格致书院之前，上海已经有了一所同名学校，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格致中学）。

至于哈巴创办的这所格致书院，相比之下显得命运多舛。1900年，它便改名为“岭南学堂”，校址也搬迁到了澳门；直到1904年才迁到了广州康乐村。钟荣光举家迁入学校临时木屋宿舍。从此他以岭南为家，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康乐村建校之初，岭南学堂只有木屋平房两座，招收男女学生61人，全部寄宿。这就开了我国教育史上男女同校的先河，较之北京

大学招收女生还早了16年。六七名女生没有宿舍，钟荣光就拨出自己的住宅二间给她们寄宿，把学生视如己出。

1908年，钟荣光出任岭南学堂教务长。他面临的重大难题就是筹措办学资金。起初开办格致学堂的计划得到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的批准，可是学校并不附属于长老会差会，而是有独立的托管会。从最早的托管会成员看，6名当中有3人是神职人员，另外3人是非神职人员。可以说，学校一开始就具有非教派性，甚至基督教神学教育在格致书院时期还是必修课程，后来也逐渐淡化了。这样一来，岭南学堂就不像其他教会学校那样由某一教会提供固定的资金来源，只能得到某些宗教组织的资助。比如1906年岭南学堂的第一幢永久性建筑（马丁堂，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办公楼）就成为第一所用捐赠者名字命名的建筑。

不过，钟荣光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依赖外国人捐款办学终非善法，中国的学校由中国人自办才是正理。1908年7月3日，在学年的最后一天，岭南学堂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筹款活动，钟荣光邀请学生家长 and 当地官员参加，由于之前的努力，这次筹款活动获得了成功，共有80人捐款，为学校建造了第一批宿舍。宿舍建成后，他建议在宿舍的门楣上用铜片刻上“某某书斋”，以纪念捐款人的善举。

在筹集办学经费方面，钟荣光有着超乎常人的能力。在旁人看来，他“能掘土为金”，“化土丘为山岳”，岭南学堂多次濒于破产停办边缘，都有赖于钟荣光想方设法，广开财源，才得以一次次渡过难关。他募捐的范围由国内扩展到国外。1909年到1910年两年时间里，钟荣光的足迹遍及东南亚和北美洲等地的16个城市。从1914至1916年，钟荣光又不辞劳苦，走遍南北美洲各埠，先后成立“岭南学校共进会”30多处。

1914年一战爆发后，西方各国疲于应付，无力东顾。平素仰赖外国捐款维持的岭南学校因此顿失财源，经费捉襟见肘。为了摆脱困境，岭南学校董事局于1917年改聘钟荣光为学校副监督（副校长）。他再度前往海外，奔走于多个城市之间，发动华侨捐款，动员华侨子弟回国读书。回国后又向时任广州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的孙中山和广东省省长朱庆澜

请求援助。当时护法军政府经济十分拮据，靠借债和华侨捐款勉强度日，但为了支持钟荣光办教育，孙中山还是捐了2000元。再加上广东省政府的拨款和华侨学生家长的捐助，岭南学校又一次渡过了难关。

这次筹款实在称得上是雪中送炭。就在钟荣光出任学校副监督的第二年（1918），岭南学校终于为第一届完成大学课程的毕业生（3人）颁发了学士学位证书，学校的中文名称也正式改为“岭南大学”。为了表彰钟荣光的功绩，岭南大学在1924年特意建造了一栋“荣光堂”。

华人校长

包括岭南大学在内，近代中国共有将近20所基督教大学，这些大学早期独立于中国教育主权之外。在动荡的民国年代，公立学校经常由于军队驻占校园或挪用教育经费而无法正常教学。反而有西方教会作为“后台”的教会学校得以免受战乱的干扰，其发展自然有所保证。1919年，美国哈佛、耶鲁等10所知名大学承认岭南大学毕业生具有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水平，同意接纳岭大的毕业生到它们学校攻读研究生。到1923年，岭大就已获得美国多达13所知名大学的认可，包括哈佛、耶鲁、康奈尔、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名校。1924年元旦，孙中山到岭南大学参观，称赞岭大“在广东可以说是第一，就是在中国西南各省，也可算是独一无二”，对岭大的“规模宏大、修理整齐、教育良善”深表赞赏。

然而，正如章开沅教授所指出的，“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断增强的民族意识更加深了中国人对教会及教会学校的反感。1920年代初，“非基督教运动”率先在上海、北京兴起。

钟荣光虽然是基督徒，但从不要求他人皈依基督。本质上，他是一位纯粹的爱国者。在反帝反封建思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吾家子弟何以全靠邻人教育，吾国土地岂可交与外国管辖？”但在具体步骤上，钟荣

光又不失理性。他认为中国教育并不发达，不能不借助国外力量办学，但一味依赖，终非长久之计，应把握时机收回自办。其过程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国人参与校务；第二期，国人应担负一定管理职责，筹措一部分经费；第三期，管理权收归国人。对收回岭南学校的具体步骤，他认为，收回岭南之第一步，是收回岭南农科大学，进而再收回岭南之教育科、商科，最后收回岭大全校。

从1926年起，全国各地纷纷掀起了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是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学校立案规程，规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办理，外国人不得在中国设办大学。经过钟荣光和爱国师生的多年奋斗，岭南大学终于收回中国人自办。翌年8月1日，私立岭南大学校董会在广州成立，由钟荣光出任校长。这在当时与以收回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主权化运动一样，具有里程碑意义。无怪乎彼时的岭南大学校刊不无自豪地报道：“外国人在中国设立之大学，其将主权完全交由中国人接管者，实以本校开其先河……”

一方面，收回主权后的岭南大学接受中国政府监管，遵行国家法令，学校的中国化色彩愈加浓厚。譬如，按照广东当局的规定，每周应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岭大不仅落实执行，而且安排校长钟荣光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发表演讲。但另一方面，岭南大学毕竟还是一所基督教背景的大学，自办后仍长期接受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赞助。因此，钟荣光在1930年的一次演讲中，明确宣布该校在“私立的、基督教的、国际的、华人主权的”办校宗旨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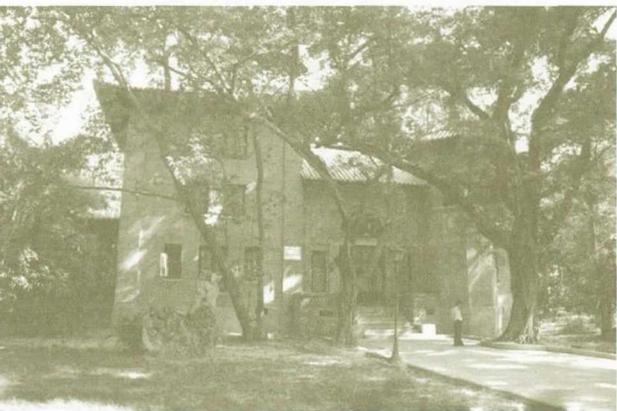
“造成南中国私立最高之学府”为发展目标。

作为岭南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的确为此倾其毕生心血精力。岭南大学的教育特色和严格校规都与其从严治学精神有关。如规定学生每日下午必须在户外运动一小时，由散步以至剧烈运动。还有假期读书、室外实习、旅行研究（老师领队至各工厂或特定地点参观）及中英文演讲比赛。岭大附中的学生生活实行军事管理，晨夕必有体操。学生军之编制、操法、号令，均按美国的《陆军操典》。大学生则另立“义勇队”，颁发新式来福枪，操演训练与陆军无异。校规方面，凡有不道德者，立即开除学籍，如考试舞弊，视为最不诚实之丑闻。凡上课、自修、体操，有迟到或未请准假而缺席者，均予记过。在宿舍内私藏食物者记过。内务不整者记过。私藏火柴者被视为抽烟记过。体操时制服不整者记过。

至1935年，岭南大学已是有着文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医学院以及独立的神学院等6个学院共30个系的综合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岭南大学还是中国第一所与美国名牌大学互相承认学位、交换留学生的大学。两年后，自觉精力不济的钟荣光宣布退休，改任荣誉校长终身，而由李应林担任岭南大学的第二任华人校长。

1942年1月7日，钟荣光在香港养和医院辞世，享年76岁。他曾做过一副挽联，总结自己的生平：“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作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

其中所谓的“惟一事工”，指的正是他本人为岭南大学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全部心血。当然，学校师生同样不会忘记这位“岭南大学之父”。钟荣光在校内的办公地点“黑石屋”被视为“圣地”，后继任各位校长皆谦让不肯入住。到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钟荣光灵柩终于由香港移葬广州岭南大学之怀士堂附近。这也是钟荣光的生前遗愿。📍



中山大学黑石屋

（作者系文史学者）